

# 明初方外诗坛生态论考

## ——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

李舜臣

(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南昌 330022)

**摘要:**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与洪武朝的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洪武前期,明太祖对佛教主要采取尊崇、怀柔的策略,很多有影响的诗文僧都出入掖庭,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甚至与明太祖赓诗唱和;而洪武中后期则逐渐转为整顿、抑制为主,一些诗文僧或惨遭流放,或罹“文字狱”,或坐“胡党案”,丛林一时噤若寒蝉。此种丛林生态,深刻地影响着明初诗文僧的创作,他们一方面以“善世”、“适应”等庄严佛曲歌赞新朝,另一方面则曲晦地表现出畏祸的心态。

**关键词:**明初;明太祖;方外诗坛;诗文僧

**中图分类号:** I2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5)03-0074-07

中国佛教向来是一种“国家佛教”,教权始终运行于政权体制之中,它的发展常取决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依托于佛寺的僧侣的文学创作、心性情感,与特定时期的佛教政策自然亦密切关联。此种情势,在大批诗文僧被广泛纳入到政教网络中的洪武朝,显得尤为突出。很多诗文僧的声誉、命运沉浮,与明太祖均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洪武朝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本文拟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考察洪武朝诗文僧的命运和创作心态,力图呈现出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

### 一、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学界关于洪武朝实施的佛教政策,已有相当成熟的认识。释见晔认为经历了“管制、怀柔、隔离”三个阶段<sup>[1]</sup>,周齐以为“基本上是恩威并举,宽

严并施”<sup>[2]</sup>,何孝荣认为是“既整顿和限制、又保护和提倡”<sup>[3]</sup>,任宜敏则以“尊崇、整顿与控制”<sup>[4]</sup>概括之。诸家的表述、内涵不尽相同,但皆认识到洪武朝佛教政策的“两面性”和“阶段性”:以洪武十四年(1381)僧录司的建立为标志,前期以怀柔为主,后期则以管束为主。这样的认识,显然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明太祖的佛缘,始于他十七岁时入皇觉寺当小沙弥的经历。这段经历,虽未使他认清佛教之本质<sup>①</sup>,但对他登基后采取的佛教政策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和尚”的身份似乎有损“真命天子”的威严,因为这是史上绝无之先例,所以他对“秃”、“和尚”之类的字眼颇觉反感;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以及彭玉莹等人借“明教”起义之事,又使他深谙佛教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对于巩固皇权的特殊作用。因此,定鼎之后,太祖屡次强调

<sup>①</sup>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四载有明太祖《御制龙兴寺碑》,白云:“于教茫然。”又,“明太祖文集”卷八《谕僧》中云:“朕不知法。”

收稿日期:2015-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释家别集叙录”(14BZW085)、全国高校古籍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元明清释家别集提要”(教古字[2014]097号)、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禅宗与诗学”(JD1427)

作者简介:李舜臣(1972-),男,江西永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佛教文学研究。

佛教“阴翊王度”、“佐王纲而理道”的功用，尝说：“佛之有经者犹国著令，佛有戒如国有律，此皆导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恶。”<sup>[5]</sup>又特撰《三教合一论》，以弥合儒、释、道，使之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

明太祖还积极地将此种思想付诸实践，频繁地征召僧人以预佛事，甚至采取“儒化”僧人的措施。洪武八年冬，“诏天下凡奇迹佛老而有志于圣贤之学者入国子学，俾习知天理民彝，然后授之以政焉”<sup>[6]</sup>。僧人入国子监习儒家圣贤之学，这在历朝都是极罕见之事。基于此一背景，那些儒释兼修、诗禅两得的“复合型”僧人，大多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例如，“博通今古，儒术深明”的季潭宗泐，太祖令其“育须发以官之”，宗泐婉谢后，又亲撰《免官说》一文赐之（《赐宗泐免官说》<sup>[7]</sup>170-171）。又如，“禅学之暇，发为文辞，抑扬顿挫，开阖变化”的来复见心，太祖尝诏侍臣取其诗览之，褒美弗置<sup>[8]</sup>。再如，“喜为儒者博贯该通之学”的独庵道衍，被太祖命事燕王藩邸，诵经祈福<sup>[9]</sup>669。明太祖将此种僧人称为“儒僧”，撰《拔儒僧入仕论》《宦释论》等文，鼓励他们积极入仕。洪武年间，即有不少儒僧被擢拔入仕。例如，释愿证（李大猷），太祖览其所著，赞曰：“论议甚高，其铁中铮铮者乎！”遂召见，敕吏部除以翰林官职。又有郭传，尝“奇迹浮屠”，以宋濂荐，进其文，太祖擢为翰林应举，升起居注迁考功丞<sup>[10]</sup>927上。洪武九年，钟山寺僧吴印“有文学”，太祖亲选命蓄发拜官<sup>[10]</sup>928下。这些儒僧在朝中还不止是“小摆设”，太祖对他们“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至有儒者李仕鲁、陈汶辉辈因疏言而被处死<sup>[11]</sup>。

陈玉女认为，明太祖“拔儒僧入仕”之举，实是他元末以来“礼贤”策略的延续<sup>[12]</sup>4。这既是历史情势的必然，更是基于他对佛教的认识。显然，明太祖看重的只是佛教的社会功能，纯是出于政教伦常的价值判断，而非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我们检视他的相关诗文，不难发现，他既鲜有深入阐发佛教义理的文字，亦无僧人圆融、清净心境之流露。此种因着外力而非出于真信仰的宗教观，决定了明太祖只能游移于佛门之外；随着外在情势的变迁，其态度必定会发生急剧的转变。

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竟多达六十四名僧人卷陷其中。明太祖似乎又听见了元末民众借宗教名号揭竿而起的呐喊，因此，调整佛教

政策势在必行。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二十四日，开设僧录司，目的即是整饬丛林。次年，又将佛教严格区分为禅、讲、教，各司其责。至洪武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间，又相继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周知板册》《榜示僧教条例》《清教录》等，明令禁止不得僧人“潜在民间”，禅、讲、教三宗“各承宗派，集众为寺”<sup>[10]</sup>936上。几年之中，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僧人的行为被限制在寺院之中，这不仅切断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而且也分化了佛教内部强大的力量。

此种政策，释见晔概括为一种“隔离政策”和“山林佛教”，其用意是使僧人远离世俗尘嚣，入深山崇谷苦修。明太祖曾说：“僧本侣影，空山俦灯，松底吟清，风翫皓月，扃已探渊。”（《钟山僧妙云》<sup>[7]</sup>175）又说：“（僧人）当深入危山，结庐以静性，使神游三界，下察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怀，景张佛教。”<sup>[13]</sup>明太祖改变原初的佛教政策，无疑是出于政局调整的考虑。不过，若是从佛教自身发展的角度评估，明太祖的此种政策导向，亦利弊参半。自元末以来，丛林风气腐败，佛教世俗化的进程十分明显，他鼓励僧人走入山林静修，从某种角度而言亦维护佛门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然而，明太祖并未仅停留这一层面，他利用“胡党”案，捕杀僧人，制造酷烈的“文字狱”，使洪武后期的丛林噤若寒蝉，僧人的心境乃至命运，亦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 二、明初诗文僧参与国家层面的佛教活动

洪武初期，明太祖倡导“擢拔儒僧入仕”，很多稍具影响的诗文僧均积极响应征召，参与各种国家层面的佛教活动。具体来说，可分以下几方面予以论述。

### （一）参与佛事、法会

洪武建极，明太祖为祈求神佑和安顿战争中死难亡灵，数诏东南高僧广演法会。洪武元年（1368），“以为折抱毁鼓之初，而殁于王事者无答焉，遂蒲车四出，征天下高行沙门”，楚石梵琦等人即被征请至蒋山说法<sup>[14]</sup>。洪武三年（1371）秋，太祖又以“鬼神之理甚幽，意先佛必有成说”，征天下有道僧三十余员，能诗者有梦堂昙噩、楚石梵琦、九皋妙声、来复见心、竺隐弘道、季潭宗泐、至仁行中等人，赴南京天界寺。洪武五年（1372），太祖设无遮法会（又称广荐法会），超度亡灵，各地僧人三

千余人云集天界禅寺。由西白万金主持,宗泐季潭、来复见心、夷简同庵、天渊清浚、天镜原澗等能诗者参与其中,尤其是宗泐季潭、来复见心凭借法会之演法,赢得了太祖的宠信。

李圣华曾根据《古今禅藻集》《明诗综》《明史》等史料,将明初诗僧应征及事迹,汇成表格,其中洪武朝有21人<sup>[15]</sup>。但实际遗漏还不在少数。仅据《列朝诗集小传》,就可补入一云大同、行中至仁、万峰时蔚、天真惟则四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被征的诗文僧,多数有着密切的法缘。例如,觉原慧昙、宗泐季潭、清远怀渭、懒庵廷俊、克新仲铭等,均为元代笑隐大衲门人;而西白万金、楚石梵琦、愚庵智及、独庵道衍、梦堂昙噩、至仁行中等,则元叟行端弟子或再传弟子,特别是洪武三年春的征诏,三十余员尊宿中,“出元叟之门者,三居一焉”<sup>[16]</sup>。这两系僧人,分属临济宗居简系与之善系,历来与统治者关系最为密切,有着积极入世的传统。

#### (二) 奉旨出使

明太祖为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及域外的关系,数次选派僧人奉旨出使,以招谕、安抚故元僧俗首领。他曾派遣克新仲铭等三人奉旨出使西藏招谕吐番,并图其山川地形以归。克新自号雪庐、江左外史,江西鄱阳人,俗姓余,著有《雪庐南询稿》《雪庐集》等。

洪武三年,太祖“择有志沙门,通诚佛国”,觉原慧昙应诏,从行者二十余人,“道经高昌、素叶诸国,诸国俱尊礼之”,甚至“膝行求法”。次年九月,慧昙因病,示寂于省合剌国(今斯里兰卡)。太祖闻之嘉惜不已:“中原有僧,万国之光。”

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二月,朱太祖以佛经有遗佚,又遣季潭宗泐师徒三十余人至西域求经。宗泐一行历时五载,“往返十有四万程,皓首还朝”,不仅求得《庄严》《宝王》《文殊》等经书,还带回来了觉原慧昙的遗衣,一时名振他邦,声闻朝阙。

#### (三) 整理佛经

朱元璋为了更好地管制丛林,统一思想,洪武五年(1372)命四方名德沙门,集于蒋山点校藏经,随即开雕,刊行了历史上所谓的“南藏”。洪武二十四年,又陆续刻录中土诸宗典籍,三十一年竣工,版存于金陵城南天禧寺,惜经版于永乐六年被大火吞噬。

洪武十年(1377),又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弘道笺释之。次年

七月,三经相继注成。明太祖在西华楼亲自接受了宗泐、如玘的进献,阅之大悦,评之曰:“此经之注,诚为精确,可流布海内,使学者讲习焉。”并撰御制序文于前,命楔梓于京师天界寺,颁行全国。

#### (四) 担任僧官

明初统领全国释教的机构是善世院,设于天界寺,首领即天界寺主持,觉原慧昙、西白万金、宗泐季潭先后担任此职。洪武七年,中天竺僧板的达主持善世院,居蒋山寺,直至洪武十四年五月板的达示寂,善世院改设为正式的机构——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僧录司设有左、右善世二员,秩正六品;左右阐教二员,秩从六品;左、右讲经二员,秩正八品;左右觉义二员,秩从八品。

僧录司的僧官均有特定职责,例如,左讲经如玘、右讲经守仁,“接纳各方施主,发明经教”;左阐教来复“简束诸山僧行,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置立文簿,明白稽考,并掌天界寺一应钱粮产业及各方布施财物”<sup>[10]932上</sup>。同时,他们还要参与朝廷的一些重要活动。例如,洪武十八年九月,太祖命蜀王朱椿阅武于中都,闲暇之余,召儒臣李叔荆、苏伯衡及名僧来复辈,与之讲道论文,殆无虚日。

总之,明初有影响的诗文僧基本都被朱元璋纳入彀中,出入掖庭,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诗文僧与政治的关系,似乎从未有过如此之密切。

### 三、明太祖的涉佛诗歌及其与僧侣之唱和

明太祖于万几之暇,亦喜吟咏。《全明诗》辑录其诗153首,涉佛诗歌约20余首。太祖的涉佛诗,多为赞佛、游寺、示僧等题材,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与僧人的倡和之作。此类诗歌现存有《赧僧韵》《赧僧锡杖歌》《赧玘太朴韵》《山居律诗十二首赐灵谷寺左觉义清浚》等,但肯定遗佚不少。例如,洪武五年,太祖敕宝金壁峰“施摩伽斛食,以赈幽冥,宠贲优渥,赐诗十二韵,有‘玄关尽悟、已成正觉’之言”<sup>[10]925下</sup>;但这12首诗,今未见任何文献记载。

季潭宗泐是明太祖最为宠信的诗文僧。太祖尝称他为“泐翁”,又将他与宋濂相比,称宋濂为“宋和尚”,称宗泐为“泐秀才”。今存文献中,尚未见到明太祖写给宗泐之诗,但《释氏稽古略续集》说他曾御和宗泐诗145首,解缙亦曾云:“故天下之士为诗,鲜有得上意者。有诗僧宗泐尝进所精思而刻苦以为最得意之作百余篇,高皇一览,不竟日尽和其韵,雄深阔伟,下视泐韵,大明之于燭火

也。盖如泐者之不足以当圣意，圣凡度量相越固如是耶？<sup>[17]</sup>太祖所和宗泐诗作数量之多，恐怕刘基、宋濂辈都难以企及。遗憾的是，原诗、和诗今俱未见存，倒是宗泐《全室外集》有 23 首题“钦和御制”者，其中最著名的是这首：

奉诏归来第一禅，礼官引拜玉阶前。恩光更觉今朝重，圣量都忘旧日愆。凤阁钟声催晓旭，龙池柳色弄晴烟。有怀报效惭无地，智水频浇道种田。<sup>[18]</sup>

据释心泰云：“（宗泐）后因长官奏事，获谴，同往凤阳槎峰建寺，三年讫工，敕赐圆通之额。十九年秋趣归天界，引见赐诗，有‘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sup>①</sup>根据用韵情况，宗泐之诗当即钦和此诗而作，内中表达了他对明太祖“宽宥”的感激和竭诚报恩之意。宗泐不仅唱和颇称意于太祖，且诗思敏捷，诗艺颇高。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十八载，洪武十五年六月，马皇后崩，九月葬于钟山孝陵，时风雨雷霆，“帝甚不果”，召宗泐至，曰：“太后将就葬，尔其宣偈焉。”宗泐随即应曰：“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帝甚悦，顷忽朗霁，遂启輶，诏赐泐白金百两。”<sup>[19]</sup><sup>296</sup>这一记载颇具神异色彩，却很好地表现了宗泐敏捷的诗才。他随即吟出的诗偈，不仅抹去了太祖的烦恼，亦巧妙地赞颂了马皇后的佛德。

清浚，字天渊，别号随庵，浙江台州黄岩人（今浙江省黄岩县）。洪武五年参加了蒋山普度大会，授为僧录司左觉义。宋濂尝极称其诗才，以为“未必下于秘演、浩初，其隐伏东海之滨未能大显者，以世无柳仪曹与欧阳少师也”<sup>[20]</sup>。《金陵梵刹志》卷一载有明太祖《山居诗十二首赐灵谷寺左觉义清浚》，而《列朝诗集》闰集卷二则存有清浚的两首和诗。我们各择一两首，以分析他们君臣唱和的旨趣：

侣影山间兴趣幽，竹鸡声断悟禅由。山房夜月明心境，水国宵灯照衲头。崖柿熟甜须九月，溪芹味美必三秋。忘尘思入重嵬迥，道备咸称释氏流<sup>[21]</sup>。（明太祖）

老来一钵住岩幽，尘境无心得自由。空里每看花满眼，镜中渐觉雪盈头。吟余月照千峰夜，定起云生万壑秋。身世已知浑是梦，百年光景水东流。<sup>[9]</sup><sup>679</sup>（天渊清浚）

清浚任灵谷寺主持，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故此组唱和诗必作于此年之后。这时期，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已从擢拔僧人入仕而转为倡导山林佛教，这组《山居诗》，反复出现的“侣影山间”、“忘尘”等语词，即是鼓励僧人忘却尘俗，走入山林；而清浚诗中主要表达了老来回归山林之况味，既有身世若梦之慨叹，亦有禅悦之风致，明显是对太祖佛教政策的积极回应。

山居诗本是佛教诗歌的特殊题材，僧人们借此表达参禅悟道的体验和山居生活的状态。明太祖所作《山居诗》除了表达对山居生活的向往之外，还是其佛教政策的诗意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明初附和太祖《山居诗》的不止清浚一人。宗泐亦有《钦和御制山居诗赐灵谷寺住持》11 首，竺隐弘道有《和御制山居诗》3 首。祁伟曾指出佛教山居诗肇始于唐代的寒山和贯休，至明代山居诗“蔚为大观”，已经成为僧人写作的“一种习惯，或者传统”<sup>[23]</sup>。此种现象出现的缘由，十分复杂，但明太祖提倡“山林佛教”及其首唱《山居诗》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明太祖与僧侣的诗歌唱和，固然不似解缙所云“大明之于燭火也”，但也不至于说它“不具有任何艺术平等的意义，更没有任何艺术的自由可言”<sup>[24]</sup><sup>43</sup>。事实上，明太祖与僧侣的诗歌唱和，深刻地影响到明初方外诗坛的创造取向，使大批僧人都参与到歌赞新朝的合声之中。譬如宗泐《全室外集》卷一所收皆为应制奉和之诗，因此，徐一夔《全室外集序》评曰：“其诗不沦于空寂，推叙功德，则发扬蹈厉，可以荐郊庙，褒赞节义。”<sup>[25]</sup>又如，夷庵同简在洪武五年的钟山法会上，“以应制篇章宣说第一义谛，声韵鸿朗，宣公红楼之作，方斯蔑如矣。”<sup>[9]</sup><sup>679</sup>明初另一诗僧止庵德祥更说：“诗岂吾事耶？资黼黻焉耳！”<sup>[26]</sup>尤可代表明初诗僧的创作取向。

“颂圣诗”，是明诗的第一波创作高潮，宋濂、刘基等开国功臣，自是引领此种创作风气的人物；而高启、张羽等吴中文人亦以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加入到盛世饶歌之中。此外，那些缁衣释子，则辅以“善世”、“遍应”等庄严之佛曲，使明初诗坛众响毕奏，缙圣绩而开来世。

<sup>①</sup>释心泰《前天界禅寺住山全室大禅师塔铭》，见《全室和尚语录》，抄本，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学界关于宗泐的塔铭、语录，征引者极罕，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近见卞东波《明初诗僧朱潭的版本及其作品在日本的流传》（载《中华文史论丛》2015 年第 1 期，第 333—365 页。）

#### 四、明初诗文僧的命运与畏祸心态

洪武前期,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主要以尊崇、怀柔为主,较少见到僧人受到责罚;但洪武中期后,太祖调整了佛教导向,以整顿、抑制为主,僧人的遭际和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分化。陈玉女《洪武年间儒僧受聘事例表》举证了慧昙“以污罪、诈欺流放西域”、愿证“郁郁而逝”、守仁“以诗触上怒,幸免于死”、德祥“以《西园诗》忤上”、宗泐“坐胡党案,但免于死”、来复“坐胡党,凌迟死”诸事,进而认为洪武朝“能够平安无事、寿终正寝的入仕儒僧几无一人”<sup>[12]8-9</sup>。这一看法未免略显绝对。其实,洪武年间的儒僧能善终者仍不在少数,有的甚至还得到了极高的礼遇。例如,如玘太朴病故于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太祖御制特撰《祭如玘文》;竺隐弘道,洪武二十四年告老,赐驿驰归,明年秋,跣跣而逝,世寿七十八岁;天渊清浚辞官后,命住灵谷寺,太祖御制诗十三首赐之。其坐化后,太祖以“恧礼部与祭祀”<sup>[10]938下</sup>。

同时,陈玉女所列举数位遇害的儒僧亦有必要略作辨析。例如,守仁“以诗触上怒”、德祥以“以《西园诗》忤上”,事见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七:

仁一尝题翡翠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祥止庵有《夏日西园》诗云:“新筑西园小草堂,熟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晓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二诗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谓德祥曰:“汝诗‘熟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密耶?”又谓:“‘六月由来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小,而不兴礼乐?‘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遂皆弃市。<sup>[19]293</sup>

兹事又载于吴之鲸《武林梵刹志》、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陈师《禅寄笔谈》卷六。但对于这两桩“文字狱”,钱谦益则力辨之:“德祥,字麟洲,钱塘人。……《西园》诗今载集中,不知所忤上者何语?野史流传不足信也。祥公有题倪雲林、周履道画云:‘东海东吴两故人,别来二十四番春。’又有《为王驸马赋清真轩》诗,则知公生元季,至永乐中尚在也。”<sup>[9]678</sup>明太祖对诗歌谬释,实难以考辨,问题在于“皆罪之而不善终”,是不符合实情

的。钱谦益考证出德祥至永乐间仍在,所谓“弃市”事,实不足为信;而守仁在洪武二十四年主天禧,后示寂于寺,亦为善终。

宗泐与来复获罪之事,亦当仔细辨析。关于这两人获罪的缘由,相关僧传资料,例如释心泰《前天界禅寺住山全室大禅师塔铭》、《南宋元明僧宝传·泐季潭小传》、《南宋元明僧宝传·复见心小传》均语焉不详,倒是钱谦益所撰《跋清教录》二文最为详细:

《清教录》条例,僧徒爱书交结胡惟庸谋反者,凡六十四人,以智聪为首。宗泐、来复,皆智聪供出逮问者也。宗泐往西天取经,其自招与智聪原招迥异。宗泐之自招,以为惟庸以赃钞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绝其车马,欲陷之死地,不得已而从之。智聪则以为惟庸与宗泐合谋,故以赃钞奏遣之西行也。果尔,则宗泐之罪自应与惟庸同科。圣祖何以特从宽政,着做散僧耶?岂季潭之律行,素见信于圣祖,知其非妄语抵谩者,故终得免死耶?汪广洋贬死海南在洪武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二年”为“十二年”误,见《明实录》),去惟庸之诛才一月耳,智聪招辞惟庸于十一年,已云:如今汪丞相无了,中书省惟我一人,以此推之,则智聪之招,未可尽信也。闻《清教录》刻成,圣祖旋命度藏,其版不令广布,今从南京礼部库中钞得,内图书馆中亦无之。

按《清教录》复见心招辞:“本丰城县西王氏子,祝发行脚,至天界寺除僧录司左觉义,钦发凤阳府槎芽山圆通院修寺住。”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府捕获胡党僧智聪供称胡丞相谋举事,随泐季潭长老及复见心等往来胡府,复见心坐凌迟死,时年七十三岁。泐季潭钦蒙免死,着做散僧。野史称复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不根甚矣。田汝成《西湖志余》载见心临刑道其师诉笑隐语,上逮笑隐而释之,尤为传会。笑隐入灭于至正四年,而为之弟子者宗泐也,来复未尝师笑隐。野史之传说,可笑如此。”<sup>[27]</sup>

《清教录》,是洪武二十四年山西捕获释智聪后,明太祖颁布诏令。依钱谦益的跋文看,《清教录》颁布后,即“不令广布”,明代很少有人亲见之。从钱氏所述看,《清教录》所载内容,或许就是清除尝与胡惟庸“爱书交结”之僧徒,是“胡党狱”在丛林的演绎。钱谦益虽力辨智聪招辞之诬,欲洗清

宗泐、来复之冤，但两人因“胡党案”而获难，却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宗泐和来复同坐“胡党案”，但最终命运并不相同。宗泐最终侥幸逃过一劫，而来复却被凌迟至死。此种原因，钱谦益推论是“季潭之律行，素见信于圣祖”；而最根本的原因，或为两人性格层面的差异。释明河就说：“国初高僧师（宗泐）与复见心齐名，见心疏放，师谨密，故其得祸为尤轻。噫，亦幸耳！”<sup>[28]</sup>蔡晶晶曾就宗泐和来复两人的性格差异，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所举一事尤能说明问题。李默《孤树哀谈》卷二载，来复“长髯数尺”，太祖怪之曰：“汝不欲仕我而为僧，吾亦任汝，然留须亦有说乎？”来复对曰：“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同样对待蓄发及出仕的问题，宗泐则显得更为谨慎，洪武八年，明太祖曾命宗泐蓄发为官，宗泐先是听其令，可待头发长了后，他才再三推免，太祖不仅未迁怒他，反而撰写《宗泐免官说》，予以旌表<sup>[24]39</sup>。可见，来复见心之所以最终“凌迟至死”，“胡党案”或只是诱因而已，最根本还在于他个人狂放的性格，不见容于明太祖。《南宋元明僧宝传·天界金禅师》中亦记载：“初高帝诏选名宿，辅导诸藩。而蜀王椿，师事见心复，复名溢都中。金叹曰：‘复公其不免耳！’复果罹难而终。”<sup>[29]</sup>正是来复一开始就不拘小节，万金西白才有此一讷言。因此，我们在探讨明太祖对待儒僧态度，还应考虑僧人的品行问题。

尽管我们努力辨清明初诗文僧的最终命运，但是，洪武中后期酷烈的政治对丛林的影响，仍是不争之史事。钱谦益《列朝诗集》载曰：

惟则，自天真，吴兴费氏子。……师有《七幸序》曰：“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八月二十九日晚朝，上命凡天下僧人，但清理册文上有名籍者，不问度牒已给未给，皆要他俗家余丁一人充军。比时在京，钦闻上命，进偈七章，其七曰：‘天街密雨却烦嚣，百稼臻成春气饶。乞宥沙弥疏戒检，袈裟道在祝神尧。’或讥之曰：‘无事请死而已。’上览偈，罢军事不果。”<sup>[22]304</sup>

惟则天真进偈以“乞宥沙弥”，虽最终被明太祖所采纳，但其中所载：“或讥之曰：‘无事请死而已’，尤可见出太祖酷烈的“文字狱”确使丛林噤若寒蝉。此种“畏祸”的心态，亦深刻地体现在诗文僧的创作中。明人徐伯龄《蟬精集》卷九“诗有警

策”记载：

国初高僧宗泐季潭有《偶成》诗云：“人事天时不可常，才逢炎暑又逢凉。芭蕉似解知秋早，蟋蟀如能识夜长。向日高台还走鹿，只今沧海已成桑。殷勤说与权豪客，鸟尽良弓合自藏。”警策之意深矣，可谓明哲保身、知几之君子乎！<sup>[30]</sup>

《偶成》诗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宗泐在明初酷烈的政治情势下的心态。宗泐示寂前尝遗言：“人之生灭，如海一沤；沤生沤灭，复归于水。何处非寂灭之地也。”言毕乃唤侍者曰：“这个颺。”侍者茫然。师曰：“苦！”<sup>[31]</sup>这一“苦”字，不仅是宗泐对人生况味的体察，更表现了明初酷烈的政治情势下僧人普遍的生存状况。

#### 参考文献：

- [1]释见晔.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J].台北:东方宗教研究,1994,(4).
- [2]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
- [3]何孝荣.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J].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7,(4).
- [4]任宜敏.中国佛教史·明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 [5]明太祖.明太祖文集·卷十·诵经论[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6.
- [6]钱宰.临安集·卷四·知止斋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5.
- [7]明太祖.明太祖文集·卷十五[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宋濂.灵隐大师复公文集序[G]//罗月霞.宋濂全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417.
- [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卷二[M].钱陆璠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69.
- [10]释大闻.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卷.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927上.
- [11]张廷玉.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陈汶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4:3988-3989.
- [12]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 [13]明太祖.明太祖文集·卷八·谕僧纯一敕[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0.
- [14]危素.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G]//楚石梵琦.佛日普照慧辩楚石禅师语录·卷二十.记新纂续藏经本.
- [15]李圣华.从方外到方内,味趋大全:明初诗僧述论[J].贵阳:贵州社会科学,2012,(2).
- [16]释自融撰,释性磊补辑.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楚石愚庵梦堂三禅师[G]//记新纂续藏

- 经:第 79 册, No1562. 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630.
- [17]解缙.文毅集·卷七·顾太常谨中诗集序[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3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680.
- [18]释宗泐.全室外集·卷一[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3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89—790.
- [19]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十八[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48 册:296.
- [20]宋濂.送天渊禅师浚公还四明序[G]//罗月霞.宋濂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504.
- [21]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御和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43 册:568.
- [22]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 16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3]祁伟.佛教山居诗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2007:162.
- [24]蔡晶晶.元末明初诗僧群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
- [25]释宗泐.全室外集·卷首[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3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87.
- [26]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二僧诗累[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02 册:684.
- [27]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七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42.
- [28]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四[G]//卮新纂续藏经:第 77 册, No1524.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72.
- [29]释自融撰,释性磊补辑.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一·天界金禅师[G]//卮新纂续藏经:第 137 册, No1501.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35.
- [30]徐伯龄.蟬精雋·卷九[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6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2.
- [31]释心泰.前天界禅寺住山全室大禅师塔铭[G]//释宗泐.全室和尚语录·卷首.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抄本.

## Research on the Ecology of Monk Poets' Circl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zu Ming and Monk Poets

LI Shun-chen

(Research Center of Contemporary Morphological Literary Theor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y of monk poets' circl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cissitudes of Buddhist policies during Hongwu Period of M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Hongwu period, Taizu Ming (founder of Ming Dynasty) adopted revered and conciliatory policy to Buddhists, which made it possible for many influential monk poets to gain access to Yeting (house of concubines), get actively involved in national affairs and even create and respond poems with Taizu Ming. Howev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 of Hongwu period, Taizu turned to rectify and suppress Buddhists, and thus some monk poets were miserably subject to exile, or Literary Inquisition or Hu Party Case. Suddenly, the monks kept silent. That ecology of monk poets' circle deeply affected their production of poem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y, on the one hand, sang the praise of new dynasty with solemn Buddhist songs such as "Shanshi" or "Bianying", on the other hand, implicitly expressed their fear of calamity.

**Key words:**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aizu Ming; monk poets' circle; monk poets

[责任编辑:郑红翠]